

《宋景诗》及其衍生文本的创作

□宋 壴

1951年夏天,随着《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以下简称《讨论》),一场批判《武训传》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掀起。陈白尘的女儿陈虹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这场大批判运动,不管怎样,可算是真正地给我爸上了一课:在人民当家做主的新时代里,文学创作与以前大不相同了,它必须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一丝一毫也不能有所偏离!为此,什么该写,什么不该写,只能听取上面的决定。”7月下旬,为配合针对《武训传》的批判,《人民日报》刊发了《武训历史调查记》,其中提到了一位“和武训同时代、同地方的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这个此前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很快便引起了读者的兴趣,“许多人希望更多地了解他和他的黑旗军的英勇事迹,许多人更要求以电影、戏剧等形式来表现他们的历史”,以此来向“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武训传》予以坚决的还击。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在文艺界领导岗位上忙得不可开交、陷入创作停滞期的陈白尘,随即被中宣部点名到北京,参加电影《宋景诗》的写作。“9月初,在周扬、邓拓、李进(即江青——笔者注,下同)等同志的指导与鼓舞之下,‘宋景诗’创作组成立了。”(陈白尘:《宋景诗历史调查记·前记》)

创作组成立后的主要任务被定为“在研究了有关宋景诗的文字材料以后,前往原山东省堂邑一带进行宋景诗的历史调查,以农民群众所提供的历史材料,来创作表现农民革命英雄宋景诗的电影及舞台剧本”。这一历史调查,无疑是对此前受到高度赞扬的“武训历史调查”的效仿,同时也标志着被郭沫若赞誉为“为中国的人民史学增加了光辉的一页”的“历史调查”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一个范式,在新中国史学界已经确立。在为期两个月的调查过程中,由陈白尘、贾霁、阿甲、翁偶虹等10人组成的调查组一共调查了8个县、163个村庄,访问了719位老人,记录原始谈话材料约18万字,此后又搜集了50万字以上的有关宋景诗的直接、间接文字材料,由人民出版社于1957年出版了《宋景诗历史调查记》(署名为“宋景诗历史调查组调查,陈白尘撰述”);而陈白尘为调查撰写的“提要”,则以《农民革命英

雄宋景诗及其黑旗军》为题,连载在1952年11月1日至2日的《人民日报》上。作为调查的最终目的,陈白尘和贾霁合著了电影文学剧本《宋景诗》,连载于1953年《人民文学》第九至第十一期,并在1956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完成。此外,陈白尘还在调查报告的基础上完成了一本“儿童读物”《黑旗宋景诗》,贾霁则撰写了一本小册子《宋景诗起义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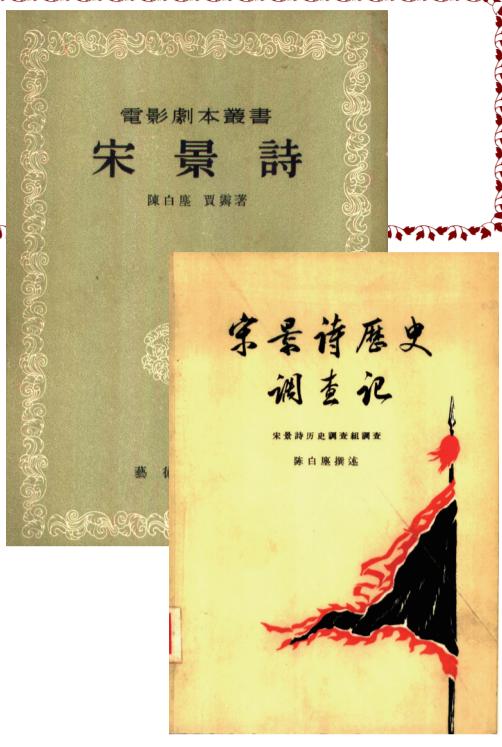
正如毛泽东一直以来所强调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作为历史文学创作的重要准备,对相关史料的充分搜集、整理、消化本是创作过程中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当这种“调查”是建立在先有“定论”的基础上、为所谓的“定论”去寻找论据,其真实性便大打折扣了;更有甚者,为达到目的不惜歪曲、捏造“史实”,使历史调查彻底沦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则从根本上动摇了历史研究的纯洁性和严肃性。美国历史学家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对此有着理智而深刻的认识。在名著《义和团运动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一书中,他以“注释”的形式阐述了对“宋景诗历史调查”的看法:

中国大陆曾出版过一部长篇历史著述:陈白尘的《宋景诗历史调查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该书部分是以口述史料为基础。作者是位剧作家,那次口述历史调查的目的是写一部有关宋景诗的电影剧本。该剧本与电影《武训传》相似,武训由一个鲁西乞丐变成慈善家,毛泽东曾严厉批评过该电影中的改良主义思想。实际上,宋景诗最先被一个“早期”调查组“发现”,这个调查组当时在搜集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材料……中国历史学家常跟我提到陈白尘的书,将它作为妄用口述历史资料的典型。因此,我在本书中极少引用它,它应被作为概述一次极复杂起义的一个尝试来阅读。关于这次起义的最新文章是本杰明·杨的《宋景诗和他的黑旗军》……在我看来,这篇文章似乎是毫无批判地依靠陈白尘的书籍。(美)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64—65页)

周锡瑞的话说得相当含蓄,但我们仍能明显从中感觉出他对调查结果真实性的怀疑,以及对

陈白尘等人的不满。其实,在查阅资料和调查访问的过程中,陈白尘很快便发现了两个疑点:首先,在宋景诗起义的时候,武训还是个少年,倘若安排二人作为对比的形象同时出现在银幕上,就会显得不伦不类;其次,则是长期以来被人们争论不休的关于宋景诗“变节”“投降”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到对宋景诗的历史评价。对于这次历史调查的原因和目的,陈白尘自然是心知肚明;而在这两个关键问题的解决上,他也是煞费苦心。

对于第一个问题,陈白尘给出的解决方案是主动回避,无论是在剧本《宋景诗》还是在“儿童读物”《黑旗宋景诗》中,以及《调查记》“提要”中,他都没有让武训露面,甚至连武训的名字都未提及。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樊粹庭创作并出版于1952年的豫剧剧本《宋景诗与武训》。这位“豫剧改革第一人”不仅让宋景诗和武训在戏里直接唱起了对手戏,而且严格遵照《讨论》定下的基调来设计人物形象、虚构戏剧冲突。在西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出版于1952年10月的单行本前,附有作者撰写的《编写宋景诗与武训的经过》,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急于“表态”的姿态:“……宋景诗愈可爱,武训便愈可憎;因此才激起我们编写《宋景诗与武训》的动机。一九五一年八月开始动笔,但是很难找出宋景诗与武训的关系事迹,所以也就很难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经过两个月的思考和友人的多次研究,才决定了初步意见。主要是:一、写宋景诗和武训青年时代的一段关系,从故事开始到结束时间约为两年。二、依据武训历史调查团所发表的人物事迹,除少数次要些的以外,其余都尽量容纳在故事里面尊重调查内容。……而在登场人物表中,作者对二人的设定为:‘宋景诗——起义农民,‘黑旗军’首领。28岁,’‘武训——流氓,统治阶级的帮凶。21岁。’由此出发,武训在剧中第一次露面,便是唱着黄色小调亮相;其好吃懒做、好逸恶劳的秉性,驱使他心甘情愿地充当以杨鸣谦、杨树坊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的狗腿子,甚至出卖农民起义领袖;而他兴办义学的目的,也因此被界定为‘教他们(地主)瞧起我’。作者历经两个月的思考和研究,最终呈现给观众和读者的却是这样一样一出与历史事实相差十万八千里的闹剧。究



其原因,固然与传统戏曲在表现形式、受众心理等方面的特点有关,但作者急于“配合”、“大胆”“领会”的意图,才是其创作的真正出发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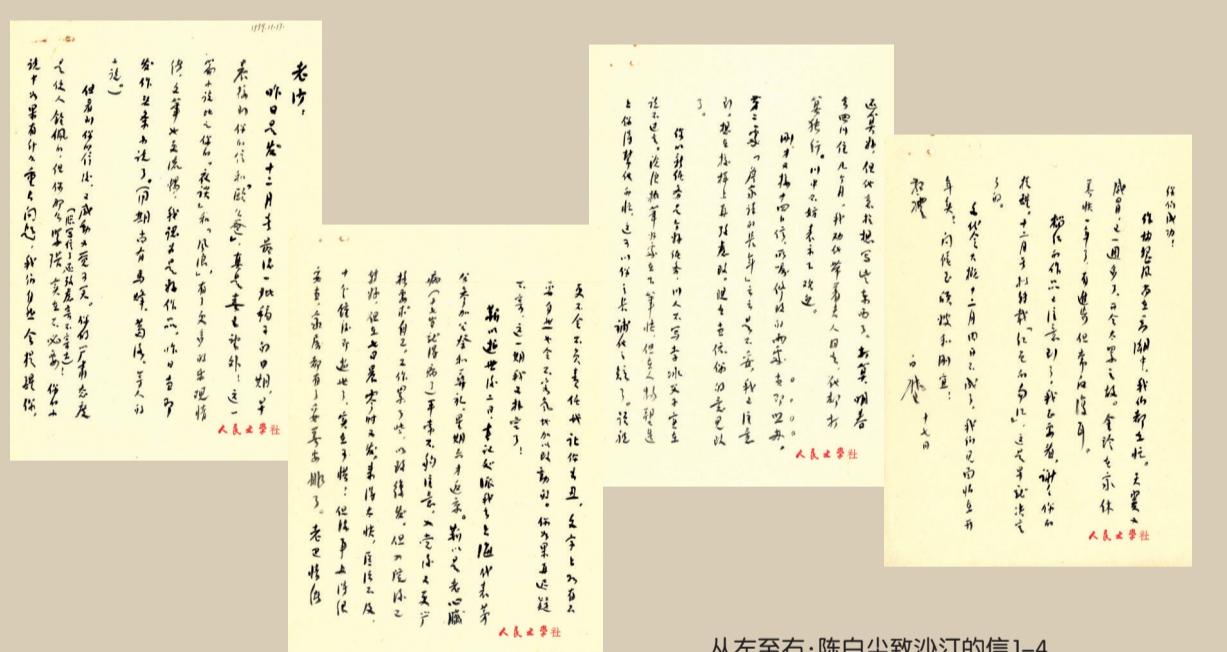
前一个问题姑且可以用回避的办法敷衍过去,但宋景诗是否曾经“变节”这一原则性问题则要求作者必须严肃对待。对此,陈白尘选择与“上级”和“权威”保持一致。据陈虹回忆,陈白尘曾就此问题当面征求江青的意见,江青指示说,“宋景诗投降清廷只是他一时的策略,不必为此去否定他的一生”;进一步咨询范文澜等著名学者,得到的答复则是“既然李进同志这样说了,你就放心去写吧!”而《宋景诗》的悲剧,恰恰正如在这种不容置疑的“权威”和敷衍了事的“保证”下酝酿出的一场苦酒。由于审查者相互之间的观点存在极大分歧,导致影片拍摄完成后迟迟不能过审,剧本和样片陷入了无休止的修改循环之中。剧本在《人民文学》上发表时,已是“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日写完。七月三十一日修改完。十月十六日三次修改完。”1954年1月27日,作者又改出了第四稿。但直到收入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陈白尘文集》时,剧本内容仍在某些方面与影片公映版本存在巨大差别。陈白尘本人并未对剧本和影片的修改作过详细说明,倒是影片导演郑君里曾有过一篇《我们在探索前进——关于“宋景诗”的修改》,发表在《中国电影》1957年第3期上。通过这篇文章,我们不难体味到《宋景诗》编创人员的苦衷和艰辛。

郑君里坦言:“《宋景诗》是我国国产第一部历史影片,我们在创作上毫无经验。在我们创作全程中,最伤脑筋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对宋景诗这个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据清代官书上记载:宋景诗曾一度向清朝钦差大臣胜保‘投降’。这是个根本性的问题。如果宋景诗果真背叛过人民,这部影片能否成立,就是个疑问。”但是这个“根本性问题”,显然无法简单地用“是”或“否”来予以肯定或否定;宋景诗一生经历的复杂性,迫使影片编创人员不得不玩起一种“逻辑游戏”来,即在充分肯定宋景诗功绩的同时有限度地承认并批评他的“投降”;充分肯定,是因为他的经历以“造反”始,又以“造反”终,期间经历了一连串的艰难困苦、迂回曲折的斗争;有限度地承认并批评他的“投降”,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由于当时的农民运动带有“自发性的弱点”;编创人员甚至还区分了宋景诗的“投降”与“诈降”之间的区别。郑君里在文章中为读者详细对比了前后三稿剧本对“投降”问题的表现,并最终提炼出如下心得:

我们一边工作,一边在学习。就在这次工作中,我们逐步学习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复杂的史料,开始懂得把农民的阶级局限性与农民在阶级斗争中的智慧和英勇区分开来,从而赋予作为农民英雄的宋景诗以应有的风貌。我们学习了:既要展示宋景诗“投降”前后各个方面的、历史的、具体的情况(包括宋景诗的主观愿望和作为),使观众对宋景诗有正确的评价,同时,还得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这些事件,使观众明白“投降”给当时人民带来些什么损害。

简而言之一句话:既不能给农民革命领袖脸上抹黑,又要充分暴露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为此,在剧本的修改过程中,编创人员无一不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稍不留神便会触碰政治高压线,后果不堪设想。陈白尘那条曾被许多人所话病的座右铭——“但求政治上无过,不求艺术上有功”——便是这种高重心态下的产物。在影片的公映版本中,政治性得到高度重视,其中不乏生硬的口号式表达,带有浓郁的说教气息,艺术性也因此大打折扣。相比较而言,作为电影剧本的“副产品”,“儿童读物”《黑旗宋景诗》却显得更为活泼生动些。可惜的是,八卷本《陈白尘文集》中却并未收录这部不那么“畏首畏脚”的作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宋景诗》及其衍生文本的诞生过程,可以视为“十七年”时期文学创作状况的一个缩影。在这一时期,作家们更多地是在扮演“杂技演员”的角色,在“政治挂帅”这根保险绳的束缚下做着高难度的“规定动作”。他们渴望像跳水运动员那样,自由腾空,轻盈入水——然而,这种渴望,更像是一种奢望。



从左至右:陈白尘致沙汀的信1-4

漫说陈白尘致沙汀的一封信

□张丹

文学馆藏陈白尘致沙汀信一封,用“人民文学”笺,毛笔竖行写,字体遒劲,落笔洒脱,满满4页纸,不删不改一气呵成。抬头直呼“老沙”,足见彼此间的熟稔。是私人通信而无私密可言,信笔所记都是当年的文坛大事。一封信关系两位文化名人,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是不可多得的“文献”“文物”。“窖藏”半个多世纪之后抄录于此,再加上些拉拉杂杂的“漫说”以助读。

老沙:

昨日是发十二月号最后一批稿子的日期,早晨接到你的信和《欧么爸》,真是喜出望外!这一篇小说比之你的《夜谈》和《风浪》,有了更多的乐观情绪,文笔也更流畅。我认为是好作品,昨日当即发作头条小说了(同时尚有马烽、葛洛等人的小说)。

但看到你的信后,又感动又可笑。你的严肃态度是使人钦佩的,但你那么紧张,实在没有必要(临写信了还考虑寄不寄出)!你的小说中如果有重大问题,我们自然会提醒你,更不会不负责任地让你出丑。文字上如有不妥,自然也会不客气地加以改动的。你如果再迟疑不寄,这一期我又扑空了!

斯以逝世后二日,书记处派我去上海代表茅公参加公祭和葬礼。星期六返京。斯以是老心脏病(十七岁就得病了),平常不够注意,入党后又更严格要求自己,工作累了些,以致复发。但入院后已转好,但在七日晨雾时又发,来得太快,医院不及十分钟后即逝世了,实在可惜!但后事办得很妥当,家属都有了妥善安排了。老巴情绪还算好,但他急于想写些东西了。打算明春去四川住几个月。我劝他带着夫人同去,他却打算独行。川中不妨表示下欢迎。

刚才又接十四日信,所嘱修改的两处,当即照办。第二处“詹家请的长年”云云是不妥,我已注意到。想在同样上再考虑改。现在当依你的意见改了。

你的新任务是个好任务,川人不写李冰父子实在说不过去。沧浪执笔好处在下笔快,但在人物塑造上你得帮他的忙,这可以你之长补他之短了。预

祝你们成功!

作协整风尚在高潮中,我们都在忙。天翼又感冒,已一周多了,开会太累之故。金玲在家休养快一年了,有进步,但常反复耳。

榴红的作品已注意到了,我正要看,谢谢你的提醒。十二月号拟转载“红色的南江”,这是早就决定了的。

文代会大概十二月内开不成了,我们见面将在开年矣!问候玉倾嫂和刚宜!

敬礼!

白尘

十七日

这封信写于“十七日”。从信中谈到的几件主要事情推断,这个日子属于1959年的11月。此时陈白尘的职务是《人民文学》副主编,正协助主编主持《人民文学》的编辑工作。

信中所谈第一件事是充分肯定《欧么爸》,直截了当称之为“好作品”。这一段文字热情洋溢,把“喜出望外”的心情表现得一览无余。何以如此?就因为这是沙汀长久嗓声之后的惊人一鸣,是作家由观望思考到奋起行动的一个重要转折。须知,为了这样一个“转折”的早日到来,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邵荃麟、张天翼……都曾写信苦口婆心劝说慰藉,胡乔木和周扬等更高层领导也曾通过多种渠道送去鼓励和支持。按说,写与不写都是作家自己的事情,即便就此封笔又与他人何干?但那个年代的“同志”关系就是那样,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大家革命路上手拉手,谁也不愿意让一个朋友掉队。至于为什么曾经长时间静默,沙汀在回复江西上饶师专中文系七八级学生詹显华的信中有一个非常客观的解释:“我解放后写的较少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担任了文艺方面的行政工作,占用了我很多时间。另一方面,当然也因为我对于新生活不如过去熟悉,需要有一个积累过程。”而《欧么爸》正是他长期的生活积累出的第一个硕果。正如陈白尘信中所言,这个中篇被

“当即发作头条”,与马烽的短篇小说《太阳刚刚出山》、茅盾的评论《从创作和才能的关系说起》、吴晗的《灯下杂谈》(《灯下集》前言)、沈从文的散文《悼靳以》等,一起刊登在《人民文学》1959年12月号上。

信中谈到的第二项内容,是沙汀创作《欧么爸》的高度严肃、紧张状态。作为一个在文坛久负盛名的老作家,创作一个中篇对沙汀来说本应是驾轻就熟,不算什么事。而事实上他写得却很不轻松很不自信,竟至于“临写信了还考虑寄不出”,而寄出去之后还要写信修改加修,谨慎小心得让陈白尘觉得“可笑”。为什么会这样?沙汀在复詹显华的信中也有一个很明白的解释:“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国家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变化又大又快,真是迅雷不及掩耳。解放前我写国统区,各方面的人物变化都不大,写起来困难就少。”“解放后,我们在从事前无古人的极其伟大的事业”,做什么和怎么做,就连“党也在探索”,一个真正负责任的现实主义作家又如何能不负责任地轻易下笔!认真细致地斟酌推敲,是因为他在认真细致地观察分析。对于1950年代的生活,他用一个公民的良知、一个作家的理性做出了这样的判断:“头几年,党在各方面大体都是正确的。大跃进当中和以后,确实出现了三风。”“不过,关于大跃进也要有分析”,“不能否认群众的冲天干劲,只能说党在领导上犯了左的错误。上面左一点,下面左得更厉害,以至党中央、毛主席要纠正那样的错误,不得不花大力气”。观察分析的结果让沙汀注意到“大跃进”必须搞清楚两个“区别”:一个是空间区别,“我国相当大,有老解放区和新解放区,情况不同,领导干部的水平也不一样”。另一个是时间区别,“大跃进初期情况还是正常的”,“后来由于引导得不好,出现了三风。粮食上不去,就瞎指挥,高估产”,再后来是“调整时期,煞住了三风,已经在恢复和发展了”。所以,他后来曾经特别声明:《欧么爸》写的是大跃进初期,“不能归结为是写大跃进”。

信中谈的第三件事是靳以的去世。靳以原名章方叙,天津人,1909年生,1959年11月7日逝世,终年50岁。靳以早年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后入复旦大学国际贸易系。学生时代即积极参加新文学运动,大学毕业后以写作和编辑为生。1933年在北京与郑振铎合编《文学季刊》。1935年在上海与巴金合编《文学月刊》《文丛》等杂志。抗战期间辗转于重庆、福建、上海之间,一边当教授,一边做编辑,主编过的报纸有《国民公报》副刊《文群》、《大公报》副刊《文艺》等。新中国成立后继续从事创作和编辑工作,担任过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作协上海分会副主席等职务,去世前正与巴金一起编辑大型文学刊物《收获》。“他为每一期《收获》要看100多万字的来稿,就是在他逝世的前一天他还在批改《收获》的稿件。”当巴金告诉他一位苏联朋友在最近一期《旗》杂志上发表了专门介绍《收获》的文章时,靳以很高兴地回答说:“我们应当把《收获》办得更好。”“他没有留下别的遗言,”巴金说,“那么这就是他的遗言吧。这就是他最后的愿望吧……”

毫无疑问,靳以的遽然离去,亲朋好友中最感痛苦的是巴金。半生合作不离不弃,一朝分别云泥永隔,巴金为此遭受的精神重创可以想见。就在靳以离去的当月,巴金连作三篇文章怀念老友。除去公祭大会悼文外,他先是《哭靳以》:“上午我到了万国殡仪馆……我好像是在做梦。怎么我在这里见到了二十三年前我们

两个人的脚迹!就是这个台阶、这个院子和这块草地,它们应该记得十几个青年作家抬着鲁迅先生的灵柩走下台阶到柩车前的情景,那么它们也不会忘记你和我吧。它们也会了解两个普通人的将近三十年的友情吧。但是为什么这样的友情就不能再继续三十年?为什么偏偏年纪较大的我来埋葬你呢?”再作《他明明还活着:“靳以是一个又直爽、又热情的生龙活虎的人……他坐不住,闲不了,他的口要讲话,手要写字;他喜欢做工作,也喜欢交朋友,帮助人。他越忙越高兴,精神越好。他一口气写了十五六篇庆祝建国十周年的文章……今年5月他入党了。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这以后五个多月中间他特别高兴,工作得更积极,任何跟他接触的人都感觉到他的心在燃烧,他的确得到了党给他的力量。他精神焕发,声音响亮,不论是工作或活动,他都不知道疲倦;他自己忘记了病,也使得别人忘记了他的病。他写的那许多文章,没有一篇不是热情的赞歌,没有一行不渗透作者对新社会的热爱。每一段、每一句都闪烁着生命的火花。这些文章今天还在读者的面前放光发热……我们不能说他已经死亡。他明明还活着!”陈白尘把《哭靳以》登在了1959年12月的《人民文学》上,却依然不能抚慰巴金的痛苦。是年底,他又借为《热情的赞歌》作序来抒发怀念之情:“靳以离开我们已经六十天了。这些日子我常常接到读者和朋友的来信,说靳以的逝世是人们的一个大损失,因为他再也不能为我们伟大的时代唱出新的‘热情的赞歌’了……但是他也给我们留下了不少美好的东西,这本集子便是其中之一……这样的文章是不会死的,这样的歌声是不会消失的,它们将永远鼓舞我们前进!”连篇累牍满怀深情的诉说,营造了“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情绵绵无绝期”的心灵境界。1979年8月11日,巴金又作《靳以逝世二十周年》:“二十年过去了。他的声音还是那样响亮,那样充满生命和信心。我闭上眼,他那愉快的笑脸就在我的面前。”1982年3月22日,再作《靳以选集序》:“我想起他,眼前就出现他伏案工作的形象。”“我认为他是一个人道主义的艺术家,有一颗富于同情的心。”“多年来我看他勤勤恳恳、认真负责地埋头工作,把一本一本的期刊送到读者面前,我深受感动。”——只有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当我们有幸读过这些文字之后,才能真正理解陈白尘信中所言“老巴情绪‘还算’好”的“还算”二字的真正含义是什么!

信中谈到的另一件事情是“作协整风”。1959年8月2日至16日,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举行,会后即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反右倾运动”(即整风)。作为意识形态的前沿堡垒,中国作家协会自然在运动中首当其冲。有资料记载,1959年11月25日至12月2日,中国作协党组连续召开十二级以上党员干部扩大会议,对郭小川的《望星空》等作品进行分析批判。陈白尘写于“十七日”的这封信中却说运动“尚在高潮中”,听口气好像很快就会高潮落去近尾声似的,而事实证明是由于过于乐观地错估了形势。

除此之外,信中还谈到了沙汀领受的新的创作任务——写为四川修了都江堰的李冰父子,谈到了张天翼、沧浪和榴红等作家,谈到了全国文代会将延迟召开的可能……所谈每一件事都有史实支撑,因而每一件都有追叙空间——所有这些内容的铺陈叠加,应该说就是这封信的主要“史料价值”吧。